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4.013

《共产党宣言》: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时代价值^①

张明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从历史性线索出发,运用内在矛盾涌动的历史发生学方法解构了关于资本主义永恒性与非历史性的虚假意识形态外表,为衡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性提供了重要方法支撑;《宣言》关于资本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论批判,对开启“中国道路”的现代主义维度与探索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以开放性姿态面对《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待科学理论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只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才是最好的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直指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的集中呈现形式。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中国语境;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4-0083-06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圣经”的《共产党宣言》,在其发表以来的170年时间里,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战斗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谱写了一幅又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①本文仅以《宣言》中深刻呈现的历史理论、资本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为切入点,通过对上述三重理论原则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在其不断互动的关系格局中建构《宣言》的当代中国“出场”形式并着力呈现出其在当下理论价值。

一 从《宣言》的历史理论来衡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性

第一,《宣言》从历史性线索出发,理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进程,并在此基础上解构了关于资本主义永恒性与非历史性的虚假意识形态外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便人为抹去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内涵,将其装扮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形式,即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永恒性。这种形而上学的历

史观,从根本上具有两大局限性:一是将历史与其现实基础相脱离,资本主义现实生产活动的历史性与局限性被人为抹去并置于历史之外,因而资本主义的“历史”不过是按照现实之外的某种尺度加以编写的神话般永存;二是将历史观与历史进程相脱离,一方面将现实的生活生产视为非历史性存在,另一方面将历史的东西视为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②这种内在阉割了现实性与历史性的历史观,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的理论操作中获得了其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过程的回溯,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表达了最为集中的批判。他们明确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③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统治秩序,有着特定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暂时存在,而非终

① 收稿日期:2018-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KS006)

作者简介:张明(1987-),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

结历史的永恒性存在。正如有学者所言,“虽然许多社会制度都喜欢用‘不朽’的神话来掩盖自己终将灭亡的本质,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①

第二,《宣言》关于资本主义所谓永恒性意识崇拜的解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科学“出场”方式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参考。正是因为《宣言》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击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为资本主义所人为装扮的永恒化与神圣化象征的意识形态拜物教,以具体的历史的暂时性为代表的辩证方式对待人类社会历史、从而建构出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路径,才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能性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言,“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因而,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秩序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构成《宣言》集中加以阐释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主要不是由某一个体或集体所推动的,而是从根本上契合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历史性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与实践要求作出了突破性发展。但从根基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非其他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不可修改的显著基因。这一方面是根植于《宣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集中阐释,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求所催生的必然结果,即“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当代最新形态,牢牢坚守了《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且实现了远大理想与新时代历史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建构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

国的科学“出场”方式。

第三,《宣言》中从内在矛盾涌动机制出发的历史发生学研究方法,为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关于资本主义非历史性的批判与理论解构,在《宣言》中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判决,而是蕴含着系列复杂逻辑分析与理论解剖于一体的辩证过程。其中,最为显著的理论特征便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机制而非抽象逻辑概念出发展开相关理论批判。进一步而言,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现实问题出发,即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机制出发加以把握,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不断涌动与冲突,一旦内在矛盾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供容纳的临界点之时,便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制度性危机爆发之时,也是革命的来临之时。《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其早期发挥了巨大魔法效应——创造庞大生产资料与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后,这种魔法已经超脱了资本主义的控制并成为转向自身反面的魔鬼,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生产力内在发展的需求,并成为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最后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走向自身的终点^⑤。很明显,这种从现实的内在矛盾机制出发透视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与从抽象伦理道德层面的所谓异化史观批判之间存在着质性差异,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矛盾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对于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换言之,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砥砺奋进的内在必然结果。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不能从单纯的抽象名词出发论证其必然性,而应当从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加以把握,尤其是从现实实践的内在矛盾运动机制的历史发生学视角加以把握。具体需要注意两个关键问题:一方面,以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新时代有其内在不断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进程,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需从“三个意味着”的角度把握新时代,即需要从近代中华民族不断求索民族主体性重建、不断推动伟大民族复兴——从站起来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变迁视角把握新时代;需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线索把握新时代的历史必然性;需要从人类求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出发,把握作为“中国方案”的新时代的理论效应^①。另一方面,从内在矛盾涌动机制的视角来看,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回应矛盾、解决矛盾的产物。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社会都具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不再是落后生产与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新矛盾从根本上是根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成就基础上所催生的人民群众更加多元、复合需求,这不仅是需求广度的增加,而且是需求原有深度的增加^④。

二 从《宣言》关于资本现代性的批判看新时代“中国方案”的理论优势

第一,《宣言》关于资本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论批判,为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性方案开辟了理论空间。马克思关于资本现代性的批判,首先是建立在对资本现代性在一定历史阶段合理性的充分肯定基础之上的,即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关系方面,将封建传统以宗法与血缘为代表的自然关系让渡于资本与金钱关系。“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⑤;另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与世界交往的扩张,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也摆脱了原先的地域局限性而成为世界性产物,并且随着而来的是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与质性提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⑥在承认资本现代性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相对合理性之后,《宣言》对资本现代性

的二律背反展开了集中批判,上文已经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系统阐释,这里不再进一步赘述。“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⑦《宣言》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其实从理论上消解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谓唯一性和排他性的可能性。因为在资本现代性充分发展的过程中,伴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已经催生了关于资本现代性的神圣化操作,这一点深刻地体现在资本主义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殖民主义进程之中。正如《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它(资产阶级——引者注)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⑧《宣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资本主义“一元现代性”的理论神话,为广大后发民族国家求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性方案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宣言》科学精神的指导下,扭转了近代以来“学习西方”却一直学而不得的困境,解决了困扰国人的时代问题——“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⑨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奠基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基座之上,并逐步开启了探索并最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之路,即“中国道路”。

第二,《宣言》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辩证态度,对开启“中国道路”的现代主义维度具有重要启示。如前所言,《宣言》关于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是以辩证的科学态度加以展开的,即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首先是建立在对资本现代性的相对合理性的充分肯定基础之上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不是采取一味拒斥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在充分肯定与继承基础之上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因此,那种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反现代主义的田园诗般的浪漫主义,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④唐正东:《社会主要矛盾新阐释:内涵及意义》,《唯实》2017年第1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⑦(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重误读。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并非是否定现代性本身进而走向前现代主义,而是反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方式,这种反对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发达物质生产的充分继承基础之上的。正如有学者所明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所建构的新现代性或新文明类型正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成果的充分占有之上^①。以社会主义为实践导向的“中国道路”,本身坚守了《宣言》中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维度充分占有的科学思想,是以建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为自身的理论图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道路”关于现代性的追求,并非是在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隔绝状态中进行的孤立探索,也不是拒斥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而退回田园诗般前现代的浪漫主义幻想之中。“中国道路”是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全新历史条件下,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相互借鉴,对资本主义先进物质生产与管理水平、经营方式进行充分借鉴与吸收^②。因此,“中国道路”的开辟及其发展,从根本上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解放与推动,从根本上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先进物质生产的学习与借鉴,它仍然代表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论预设,只不过这种未来的现代主义理论图景以社会主义的价值框架为导向,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为历史基座展开的新型探索性实践。

第三,《宣言》关于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为新时代探索现代性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价值引导。《宣言》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并非是一种抽象的伦理批判,而是以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深入到资本现代性内部的分析与批判方法,“这种批判立场牢牢地把握住了现代世界之历史的前提和历史的界限。”^③正是建立在对《宣言》上述科学精神原则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启了关于后发民族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探索的“中国方案”。如何理解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四个不是”加以概括,即“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

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④。换言之,现代性的“中国方案”既不是走向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浪漫主义,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僵化模式——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的“老路”,更不是全盘导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邪路”,而是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强烈符合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全新探索。正因为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本身自我发展的内在困境,另一方面也因为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在求索现代性过程中所深刻面临的“实现较快发展”(西方“一元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与“保持自身独立”之间的深刻矛盾,使得以“中国方案”为代表的这种全新现代性探索的世界理论效应正逐步彰显与扩大,这就是《宣言》中深刻揭示的以超越资本现代性为价值导向的一般规定与当代中国牢固立足自身实际展开独立探索的特殊经验之间的有机融合。

三 从《宣言》的精神实质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路径

《宣言》既是一个关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政治文本,也是一部关涉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重大理论文献。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语境中如何定位《宣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里不妨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⑤也就是说,经典作家本身并未将《宣言》视为一成不变的神圣化存在,而是始终以开放性姿态面对《宣言》,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完善甚至是推翻《宣言》中的具体结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⑥

①吴晓明:《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世界哲学》2018年第1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吴晓明:《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世界哲学》2018年第1期。

④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

第一,以开放性姿态面对《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待科学理论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在 21 世纪与当代中国语境中阅读《宣言》,其时空环境较之于马克思时代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展开阅读绝不是要固守《宣言》中的每个具体结论,以此来衡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一种运用理论裁剪活生生现实的教条主义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宣言》的态度,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特征。这种开放性特征,在理论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所建构的,既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思辨的怪圈,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问题;这种开放性特征,在实践上是由无产阶级革命不断运动变化的发展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即理论的创制只有不断契合动态变化的实践,才能始终保持自身的生命力。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与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之所以能够不断保持生机与活力,关键在于以开放性姿态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断结合变动的实际突破理论原先的逻辑边界,进行新的突破性创新与发展。因此,对待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树立科学的理论态度,这就是既不能陷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崇拜”,不敢越经典雷池一步的保守主义误区;也不能走向盲目照搬“语录”、剪裁现实的拿来主义误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从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②

第二,坚持是最好的发展,只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不是能够求解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也不是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直接照搬使用的教义,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指引,这就是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展开具体的分析与思考。那种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

导,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具体结论不动摇、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于实践或理论都是有害的。从实践层面来看,运用固定理论去裁剪、框架现实,只能阉割实践的生动性,进而走向理论滞后实践的误区,从根本上不利于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从理论层面来看,坚守每一个具体结论不动摇,看似是对理论的坚持,但实际上遏制了理论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下实现自身突破与发展的空间。毛泽东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曾明确指出,从来就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本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加以应用,呈现出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③。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不断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其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开放性姿态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能够不断结合深刻变动的实践特征在理论上做出新的突破性发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建构当代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出场”形式。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凡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都从本质上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凡是能够结合具体实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做出突破与发展的,都从实际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坚持与发展二者在根本上处于辩证关系之中,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不是对基本原理的否认;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坚持,通过发展不断赋予经典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出场”,不断赋予经典理论以新的生机与活力。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源于时代”但又“超越时代”,成为时代与人类精神的精华,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⑤。

第三,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直指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的集中呈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 21 世纪的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科学把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笔者以为,回答这一总问题其实可以进一步细化为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 年 7 月 2 日第 2 版。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14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8-259 页。

⑤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8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三个方面的分问题,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二是如何对待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三是如何对待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仍将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责任,主要不是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家身上,而主要是通过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加以实现。因此,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结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与中国实践的具体实际,对上述三大问题进行科学解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上述三大问题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论结晶,创造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实质,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与精神之钙,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①;就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

题的重大政治判断,将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相互学习、相互竞争视为基本方略而坚持。并且,通过建构超越民族国家、阶级关系与政治意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视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对外交往关系的重要准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重大突破性发展。就共产党的建设问题而言,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比较空缺的部分,也正是因为在这问题上的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践走了不少弯路与曲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并将其提升到关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高度的“伟大工程”,明确将党的建设规律归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②。可见,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集中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其产生与发展不是封闭于书斋中的抽象理论思辨,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始终坚持以科学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扎根中国实践、直面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立足于中国经验,进而不断发展并创造出科学的理论形态,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ts Times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ZHANG Ming

(School of Marxis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 and Engels use the method of history genetics of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ased on historical cues to deconstruct the false ideological appearance of perpetual and non-historical nature of capitalism, providing important methods for measuring the logical inevitabil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The criticism on the duality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in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value guideline in opening up the modernist dimension of the “China Road” and exploring “China Approach”. It is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Marxism to face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ith an open attitud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scientific attitude towards the scientific theory. The best way to adhere to Marxism is to constantly develop its contemporary form.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based on China, faced to the world and directly aimed at the issues, serves as the concentrated presentation of its vigor and vita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ism; Chinese context; value of the times

(责任校对 刘兰霞)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